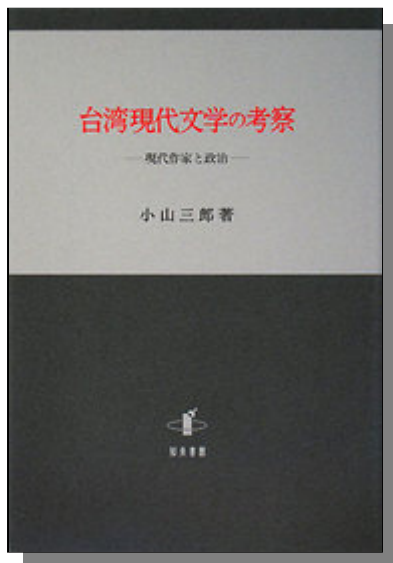


對比的文學史——評介《台灣現代文学の考察 ——現代作家と政治》

許菁娟*



作者：小山三郎
出版社：東京，知泉書館
出版時間：2008 年 7 月
頁數：266 頁

壹、前 言

本書作者小山三郎先生為日本研究中國近現代政治文學史著名的學者，出身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在學期間受業於石川忠雄、村松暎等日本著名的中國研究者，後並取得該校法學博士。作者長年鑽研中共文藝政策史，撰有《現代中国の政治と文学——批判と肅清の文学史》（東京：東方書店，1993 年）、《文学

* 日本一橋大學文學博士，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現象から見た現代中国》（京都：晃洋書房，2000年）等書。前者探究左翼作家和中共之間的關係，透過對西元1930年代的國防文學論爭、西元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西元1955年的胡風事件、西元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及西元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現象的考察，研析毛澤東的「文藝講話」如何否定魯迅的文學理念，指出中共建國後繼承魯迅文學精神的作家紛紛遭到整肅的事實。後者則以諸如國防戲劇《賽金花》、電影《武訓傳》、京劇《海瑞罷官》、電影《苦戀》等曾備受中共批判的作品作為考察對象，一方面研析這些作品之所以遭到批判的原因與其背後牽涉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則透過這些作品探討西元1930年代到西元19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後的文學潮流，指出中共所揭櫫的「文學應為政治服務」的主張長期以來如何滲透、支配文學領域，以及作家、作品之評價極易因政治情勢之影響而有所改變的事實。

近年來，作者將研究觸角延伸到台灣文學領域，曾發表有關魯迅與梁實秋的論爭、《自由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學精神、柏楊被捕事件，以及國民黨政府籌拍台灣版電影《苦戀》等課題的論文，現進而結集為本書。其構成如下：

- 第一章 序論
- 第二章 魯迅與梁實秋——他們的論爭所呈現之作家與政治的關係
- 第三章 國共關係之中的政治與文學——關於梁實秋批判
- 第四章 《自由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與文學
- 第五章 有關柏楊被捕事件的考察
- 第六章 統戰工作之中的台灣電影《苦戀》
- 第七章 政治與台灣現代電影——復甦的「三十年代文學」

由上可知，本書旨在探討西元1950~1980年代國民黨政府與台灣作家之間的關係，並釐清兩岸之間的政治對立及中國文學界的動向對台灣文學領域帶來的影響。值得注意的，作者此一考察乃是以其對中共文藝政策的研究為基礎，以對比的視野探討台灣的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因此，本書雖名為《台灣現代文學的考察》，但實質內容毋寧較為接近比較文學史。而且，有別於一般研究者只探討台灣本土發生的現象，作者考察的範圍不限於西元1949年以後的台灣，而是選擇以西元1930年代魯迅和梁實秋之間的一場論爭，作為本書論述的開端。

貳、從魯迅與梁實秋的論爭到「抗戰無關論」論爭

魯迅和梁實秋，一被視為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舵手，一是新月派的代表作家，雙方立場壁壘分明。西元 1930 年，兩人曾針對普羅文學是否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場論爭。據作者指出，在論爭中，雙方雖就普羅文學的是非對錯問題針鋒相對，但又同樣展現出極度厭惡政治介入文學領域的立場，並共通表明對普羅文學的某種擔憂。梁實秋的擔憂在於他無法苟同普羅文學者將文學限定在「階級」如此狹隘的範圍，且將文學視為「階級鬥爭的工具」。而魯迅雖認為梁實秋對普羅文學的認知並不正確，但也承認當時上海文壇的確存在著梁實秋所說的那種褊狹的普羅文學潮流，魯迅並起而批判這種潮流。換句話說，理應處於對立的魯、梁兩人，卻展現出一種共通的文學精神，堅持文學乃是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存在，不應受政治的干預。

作者進一步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因為魯迅的這種文學精神和中共黨員派作家格格不入，以致使他後來在左翼作家聯盟中逐漸被孤立，雙方漸生嫌隙，終在西元 1936 年的國防文學論爭中爆發開來。在這場論爭中，黨員派作家主張文學應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服務，並訂出種種嚴格的創作規範。對此，魯迅雖無意反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卻主張作家有其主體性，力陳政治不應干涉作家的創作，並痛批黨員派作家的做法，無異是在剝奪作家觀察社會的自由。

饒富興味的是，這場魯迅和黨員派作家的對立，最後雖因中日戰爭擴大到上海以及魯迅病逝而不了了之，但到了西元 1938 年「抗戰無關論」論爭發生時，同樣的對立又再度上演。只是，這次卯上黨員派作家的人由魯迅變成梁實秋。據作者分析，不僅梁實秋在這場論爭中的文學主張，和魯迅先前在國防文學論爭中所堅持的「作家之主體性」的主張大同小異，連中共黨員作家批判梁實秋的論調，也和他們在國防文學論爭中批判魯迅的論調如出一轍。而且，中共黨員作家據以批判他們的論調，實乃是從魯、梁兩人曾引以為憂的上海左翼文學運動潮流中衍生出來的。

作者帶領我們回顧西元 1930 年代的文學史，告訴我們早在左翼文學運動勃興之初，即已出現政治介入文學領域的情形，而且這種情形有日益嚴重的傾向。在此時代潮流中，魯迅與梁實秋共通展現出一種追求作家主體性的文學精神，斷然拒絕來自政治的干涉。

作者的這種見解確實令人耳目一新，但對關心台灣文學的讀者而言，讀到此處，或許依然存有一個疑問：為什麼作者對台灣文學的考察要從探討魯、梁兩人所共通擁有的文學精神開始呢？

考其原因，可能與魯迅、梁實秋兩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其象徵性有關。在

我們的傳統認知中，魯迅是偏中共陣營的左翼作家，梁實秋則是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自由主義派文人的代表人物，雙方理應是水火不容，作者卻指出他們其實擁有共通的文學精神。不僅如此，作者還進一步指出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西元 1949 年以後，不論是在台灣或是在中國，都有作家繼承他們的此種文學精神，並因此衍生出一連串作家和政治之間的衝突事件。換句話說，海峽兩岸的作家政治立場固然相異，卻擁有共通的文學精神，並屢屢在同一時期起而挑戰各自面對的政權。像這種宛如互相呼應般的現象正是作者感興趣之處，也是本書探究的重心。而此一文學現象的呈現，及作家自主性文學精神的源流，皆可以回溯到魯迅和梁實秋身上，這或許就是作者之所以選擇魯迅與梁實秋的論爭作為其考察之開端的理由。

參、從《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到柏楊

接著看看作者如何剖析這種文學精神在兩岸所分別衍生出的現象。

在後續的章節中，作者首先指出西元 1942 年毛澤東發表「文藝講話」，確立中共的文藝路線，並建構政治相對於文學的絕對優位性，但正如同西元 1948 年的蕭軍批判事件、西元 1951 年的電影《武訓傳》批判事件、西元 1955 年的胡風事件，以及西元 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所顯示一般，繼承魯迅精神的作家們，不斷起而挑戰中共的文藝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認為從同一時代身處台灣的《自由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也可見到相同的現象。據作者指出，這一批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初將批判的矛頭對準中共的獨裁體制，並痛批中共連番整肅作家的行為。但是，當其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在台建構一黨獨裁體制，並試圖控制文藝、思想領域時，他們逐漸意識到國民黨政府和中共有著相同的獨裁體制，因此回過頭來將批判的矛頭也對準國民黨政府，並開始批判中華傳統文化所內含的君權思想正是滋生獨裁政權的溫床。

重要的是，作者提醒我們，若是將《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和同一時期不斷起而挑戰中共的大陸作家相對照的話，便可發現他們所展現的文學精神有其共通性，不僅上承西元 1930 年代魯迅、梁實秋所曾提出的自主性文學精神，而且皆不見容於想要強化一黨統治的政治體制。此外，《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批判也相通於魯迅所說的「國民性的改造」。作者認為，凡此在在意味著《自由中國》知識分子承襲了西元 1949 年以前的政治與作家之間的關係。

除了《自由中國》知識分子之外，作者進一步指出相同的現象也可見於柏楊身上。西元 1965 年，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引發一場席卷全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當文革的影響延燒到台灣時，則導致柏楊被捕入獄。眾所周知，柏楊是台灣著名的反共作家，於西元 1968 年遭國民黨政府以「親共」的罪名逮捕入獄，後於西元 1977 年獲釋出獄，同時並被延聘至政府的反共機構。作者對柏楊事件的考察，即從如下基本的問題開始：理應是「反共」作家的柏楊，當初為什麼會因「親共」的罪嫌被捕入獄？後來又為什麼會以「反共」作家的身份獲釋出獄？

對此，作者指出柏楊之所以會被冠上「親共」的嫌疑，主要是與蔣介石為對抗文化大革命而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關。也就是說，蔣介石汲取過去在中國大陸推行新生活運動的經驗，一方面彰顯中華文化，以對抗文革對中華文化的破壞；另一方面，則試圖藉以強化中華文化中的家父長體制，以鞏固其政權。而柏楊從西元 1960 年代初期開始執筆的一系列雜文，站在小市民的立場，質疑台灣社會的不合理現象，並將這些現象的成因，歸究於中華文化的負面影響。對於柏楊上述的批判，國民黨政府過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到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發起之後，柏楊的雜文變成是對國民黨權威的挑釁，因此必須將之逮捕下獄。

再者，作者也指出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會於西元 1977 年突然釋放柏楊，原因與當時中國的政治動向有關。也就是說，在當時追求「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國際政治潮流中，國民黨政府為了向國際輿論界及標榜「人權外交」的美國政府強調其「自由中國」的形象，才決定釋放柏楊。換句話說，正如同柏楊當年被捕下獄一樣，其出獄也是受到彼時政治情勢的影響。有趣的是，作者神來一筆突然舉吳晗為例，指出文革後鄧小平政權雖然為吳晗恢復名譽，但對他在《海瑞罷官》中所表現的歷史觀的是非對錯問題，則置之不問。同樣的，國民黨政府雖於西元 1977 年釋放柏楊，並恢復其反共作家的地位，卻從未提及柏楊當年對中華文化的批判究竟是對是錯。作者指出，這意味著柏楊和吳晗的平反一樣，都是政治考量大於一切。

肆、轉變中的「三十年代文學」評價

除了觀察西元 1970 年代後期，中台之間的政治情勢是如何影響國民黨政府與作家的關係之外，作者也考察了國民黨政府對同一時期中國文學動向的觀察和反應。據作者分析，文革結束後，一些曾在文革中被整肅的西元 1930 年代的左翼作家，及西元 1949 年以後因抵觸中共的文藝政策而遭到肅清的作家，紛紛被恢復名譽，並再度發揮他們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暴露文革的真實面貌。對此，鄧小平政權原採取默許的態度，藉以與毛澤東時代有所區隔。然而，當作家的現實主義文學

精神復活之後，卻逐漸脫離鄧小平所設定的政治框架，不僅做出異於中共的文革解釋，並產生傷害中共權威的作品。

作者指出，上述中國文藝界的情況引起國民黨政府高度關注，尤其是西元 1981 年電影《苦戀》批判事件，更是讓國民黨政府反應激烈。由於電影《苦戀》刻畫一位從美國回歸中國的知識分子悲慘的際遇，而在當時中共不斷提倡和平統一，並呼籲海外華人回歸祖國的背景下，國民黨政府認為《苦戀》極具利用價值，正可用以對抗中共的統戰宣傳，並批判中共的人權、社會自由問題。於是，國民黨政府甚至拍攝了台灣版電影《苦戀》，用於反共宣傳。

此外，作者指出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文革後中國文藝界的此一動向，其實促使國民黨政府大幅度地改變其過去對西元 1930 年代左翼作家及現實主義文學的負面評價。過去，國民黨政府始終認為左翼作家為中共推行統戰宣傳工作，因此對他們採取敵視的態度。但到了西元 1970 年代後期，國民黨政府開始產生新的看法，認為左翼作家之所以投向中共，是受到他們強烈的愛國情懷所驅使，但因欠缺識人之明，遂成了遭受中共欺騙的犧牲者。同時，這種認知上的改變，也使國民黨政府開始認為左翼作家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是源之於其愛國情懷，並進而逐漸將現實主義文學從應被否定的對象中摒除。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有此轉變，據作者分析，原因其實牽涉到此一時期國民黨和中共在文化領域的正統性之爭。作者也特別強調，國民黨政府對左翼作家及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評價之改變，主要是受到國民黨政府對中國政策改變的影響，不宜單純地理解為國民黨政府對文藝領域的全面鬆綁，即便如此，此一改變確實為現實主義文學在台灣找到生存的空間。

讀到此處，令人不由得想起本書的一開始，作者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也就是台灣是什麼時候開始開放魯迅的作品？其實，開放魯迅的作品即意味著現實主義文學的解禁，這或許乃是作者之所以有此提問之因。換句話說，作者想指出的問題是，在台灣的政治環境下，左翼作家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可以被接受？最後，作者指出西元 1970 年代後期以降，國民黨政府對現實主義文學評價之轉變，無疑的，為其後魯迅文學及現實主義文學的解禁，預留了實現的空間。

伍、結 語

作者引領我們回顧從西元 1930 年代的中國到西元 1949 年以後的台灣，所發生的種種政治與文學的糾葛。其獨特的切入角度，對不同時空之文學現象的同質性之洞悉，以及書中許多精闢的見解，不僅在在令人折服，同時也為我們思考西元 1949

年之前及之後的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時，提供了許多線索。例如據本書前半的探討，可知就西元 1930 年魯迅與梁實秋的論爭到西元 1938 年的「抗戰無關論」論爭觀之，此一時期政治和文學之間的衝突，主要源於作家對自主性文學精神的追求；迨至本書後半，就西元 1949 年以降，台灣和中國的文學現象觀之，則衝突的起因，似乎已不僅止於自主性文學精神的要求，背後往往存在著現實主義文學精神與獨裁政治的對峙。像這種衝突原因之實質內涵的轉變，究竟所由何來？是否與絕對性政治權力的建立有關，值得我們進一步細究。

綜觀戰後的台灣文學，誠如作者所指出的，國民黨政府來台，除了將大批作家帶進台灣之外，也將中國大陸時期的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帶進台灣。因此，深入了解西元 1949 年以前的政治與文學的關係，並釐清此一關係對台灣文學領域的影響，將有助於掌握國民黨政府統治下台灣文學的全貌。關於這一點，相信本書應能帶給我們莫大的啟示。

